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唐代咸通玄宝考

霍宏伟

【编者按】中国国家博物馆经过长达4年的改扩建工程，成为世界上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已于今年3月1日正式开馆。该馆收藏有20余万枚钱币，汇集了许多著名收藏家诸如罗伯昭、沈子槎、戴葆庭、郑家相、陈仁涛等人的钱币精品以及部分考古发掘品。作为该馆重要专题陈列之一的“中国古代钱币展”，将于近期对公众开放。为了及时反映该馆的钱币收藏情况，本刊特别推出“国博藏泉”栏目，邀请特约撰稿人、国家博物馆霍宏伟博士，采取“一钱一议”形式，撰文介绍该馆具有代表性的钱币藏品。

唐代咸通玄宝铜钱，因铸造时间短，存世数量极少，被泉界誉为“唐泉第一珍”。今以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下简称“国博”）收藏的两枚咸通玄宝钱作为切入点，结合历史文献及实物资料，对与该钱相关的一些学术问题略做探讨。

一 国博馆藏咸通玄宝及此类钱币类型

国博馆藏咸通玄宝钱均为铜质，圆形方孔。钱文“咸通玄寶”，楷书，直读，钱文笔画不甚清晰。正面外郭上宽下窄，背平素。第一枚钱是1957年罗伯昭先生捐赠，钱径22.6—23、穿宽6.5—7、郭厚1.5mm，

重3.9g（图1：5，封底图1）；第二枚钱是1959年沈子槎先生捐赠，钱径23mm，重3g（封底图2）^①。

笔者所见出土咸通玄宝有2枚，分别发现于四川新都、甘肃宁县五代十国钱币窖藏中（表1）。1989年5月，四川省新都县新繁镇繁江商场基建工地在开挖地基时，发现一处钱币窖藏，重约340公斤，后整理铜钱共计62604枚。包括西汉半两、两汉五铢、新莽货泉与布泉、直百五铢、北周布泉、北魏永安五铢、隋五铢，唐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咸通玄宝，五代十国时期前蜀通正、天汉、光天、乾德、咸康元宝。其中，咸通玄宝钱铸造精整，狭轮，笔画较为清晰，直读（图1：1）^②。

1990年10月，甘肃省宁县广播局基建工地发现一处五代十国时期的钱币窖藏。该窖藏为一椭圆形坑，长约2.5、宽约1.5、距地表深约2米，坑内干燥，无盛装器皿。所出钱币有20余个种类，上至汉半两，下迄五代十国前蜀王衍咸康元宝。以开元通宝和会昌开元数量最多，占95%以上。其中出土咸通玄宝1枚，“咸通玄”三字较清晰，“寶”字笔画模糊，背面内郭不显（图1：2）^③。

表1 国博馆藏与其他地区出土咸通玄宝比较一览（尺寸：mm，重量：g）

出土时间	出土（馆藏）地点	钱径	穿宽	郭厚	重量	资料来源
	国博	22.6—23	6.5—7	1.5	3.9	注①
	国博	23			3	注①b
1989年	四川新都	23.5	7	1.5	3.8	注②
1990年	甘肃宁县	24	5	1.5	4	注③

四川新都、甘肃宁县发现的钱币窖藏有一些相似之处，如均为五代十国前蜀钱币窖藏，出土唐钱数量最多，且两处窖藏地点距离相对较近。将4枚咸通元宝与武德开元进行比较，可以总结出其基本特点：

第一，铸造粗糙，制作水平下降，表现在正面外郭上宽下窄，郭边宽窄不均，背面或为平素，或轮郭略显。

第二，钱文字体已不像开元钱那样篆隶意味较浓，更多地反映出楷书字迹特点；因制作工艺水平的限制，钱文笔画不甚明晰，笔画较多的钱文如“通”、“寶”等，字迹较为模糊。

第三，咸通元宝与晚期开元钱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如钱径较小，铸造粗陋，轮郭宽窄不均，背郭近平，显示出晚唐整体铸钱水平的下降。

《中国钱币大辞典·唐五代十国编》将著录的4枚咸通元宝分为阔轮与狭轮两种类型。笔者根据收集到的咸通元宝拓图，归纳出背有轮郭型、背平素型两类钱币（图1）^④。

背有轮郭型：正面轮郭较背面略窄，正面轮郭上部、右部较宽，左下部较窄，背面轮郭较宽，内外郭明显。

背平素型：正面轮郭上部略宽，下窄，文字笔画不甚清晰；背面平素，无内外轮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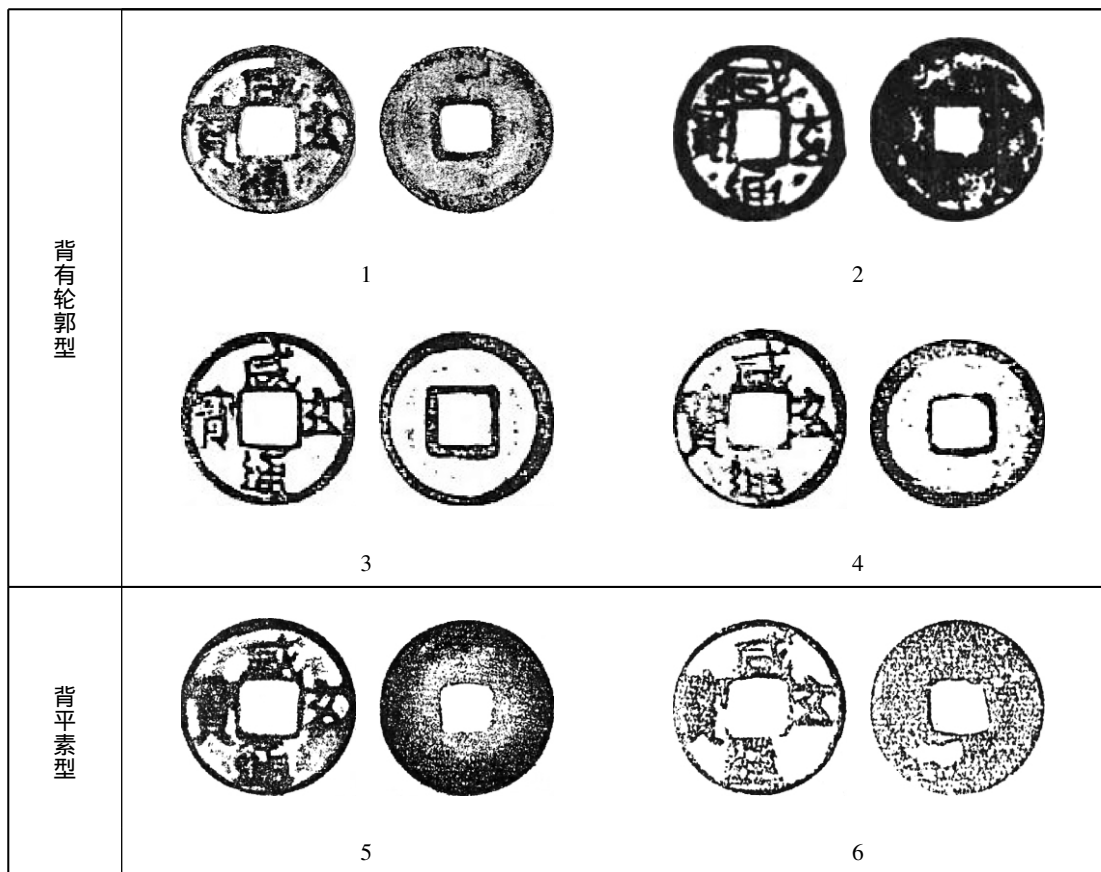


图1 咸通元宝类型

1. 四川新都钱币窖藏 2. 甘肃宁县钱币窖藏 3. 《古钱大辞典》1
4. 《古钱大辞典》2 5. 国博馆藏 6. 《中国钱币大辞典·唐五代十国编》4

二 咸通玄宝的著录与收藏

咸通玄宝未见两《唐书》等正史记载，目前所见最早记载该钱的史籍为南宋洪遵《泉志》：

右咸通钱，旧谱曰 “唐咸通十一年，桂阳监铸钱官王彤进新铸钱，文曰‘咸通玄宝’，寻有敕停废不行。”^⑤

《泉志》所附钱图，“通”字位于穿右，“玄”字在穿下，与今见钱币实物文字排列顺序不同。笔者检索《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未找到铸钱官王彤之名；据“寻有敕废铸钱”一句，详查《唐大诏令集》、《唐大诏令集补编》、《全唐文》等书中有关咸通时期的皇帝诏书，未见与此有关的诏书。

其次是南宋王应麟辑《玉海》：

钱谱曰 “咸通十一年，桂阳监铸钱官进新铸钱，文曰‘咸通元宝’，寻废不行。”^⑥

《泉志》记此钱名为“咸通玄宝”，《玉海》称为“咸通元宝”，从而引发清代学者的讨论。《古泉汇考》云：

旧谱曰 “唐咸通十一年，桂阳监铸钱官王彤进新铸钱，文曰‘咸通玄宝’，（培按：洪《志》引作玄宝，而《玉海》引作元宝，若谓是避帝讳作元，岂洪遵非宋人耶？然玄宝为钱文所仅见，今又未见此钱。两存其说，可也。）寻有敕停废不行。”《钱币考》曰：按此钱惟郴州铸之，益信大历、建中二钱为偶铸矣。培按 《泉志》所载，自上至右读之。（喜海按：此泉今世罕见，藏钱家未有著录者。）^⑦

《玉海》云“咸通元宝”，改“玄”为“元”，确为避讳北宋始祖玄朗。例如，“《崇文总目》道书类，有吴筠撰《真纲论》一卷，其后又有《元纲论》一卷。《东观余论》校正《崇文总目》云‘此前已有所谓《真纲论》即此，盖避圣祖名也。’圣祖，即宋所谓始祖玄朗。一改玄为真，一改玄为元，其实一书也。”“宋讳玄，清亦讳玄。”^⑧而

《泉志》未避讳始祖之名，称“咸通玄宝”。

民国时期，咸通玄宝存世数量极少，鲜有藏泉，仅见张叔驯、罗伯昭、沈子槎等人收藏^⑨。张叔驯藏品拓本见于陈达农收藏的古泉拓本扇面之二^⑩。《古钱大辞典》上册著录有2枚咸通玄宝拓本（图1：3、4）^⑪，《历代古钱图说》收录一枚咸通玄宝拓本，与《古钱大辞典》上册的第一枚咸通玄宝相同，后马定祥先生加以批注 “咸通玄宝有二、三种版，皆珍。”^⑫

建国以来，零星见有此类钱币的收藏报道，真假难辨，亦有对此类钱币的简述与著录。彭信威先生在《中国货币史》中谈到该钱性质 “旧谱载懿宗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桂阳监曾铸造咸通玄宝。这大概是一种试铸性质，而且限于一地，留传极少。”^⑬《中国钱币大辞典·唐五代十国编》著录有4枚咸通玄宝拓本，前两枚采自《古钱大辞典》，第3枚为国博馆藏^⑭。《戴葆庭集拓中外钱币珍品》所收录的一枚咸通玄宝拓本^⑮，经拓图对照，与现藏国博、本文介绍的第一枚咸通玄宝是同一枚钱币。国博馆藏咸通玄宝钱径22.6-23mm^⑯，《戴葆庭集拓中外钱币珍品》所收钱拓并非原大印制，而是略微放大，钱径达到26mm。

三 咸通玄宝钱文辨析

“咸通玄宝”钱名源自咸通年号，正如《泉志》所载 “唐咸通十一年，桂阳监铸钱官王彤进新铸钱，文曰‘咸通玄宝’。”^⑰但民国时期的钱币学家方若认为 “咸玄通宝，隶书，旋读。洪《志》以此品实唐咸通年号，读‘咸通玄宝’，非也。”^⑱却未提出依据。

回顾一下唐代钱文读法，可以对“咸通玄宝”之名有一个更为深刻的理解。唐代最早的钱币为开元通宝，有“开元通宝”与“开通元宝”两种读法^⑲。乾封泉宝是唐代第一种年号钱，钱文为旋读。《旧唐书·高宗本纪下》：麟德三年（666年）春正月，“壬申，御朝觐坛受朝贺。改麟德三年为乾封元

年，……五月庚寅，改铸乾封泉宝钱。”^② 乾元重宝为唐政府铸行的第二种年号钱。《旧唐书·肃宗本纪》：乾元元年（758年）秋七月，“丙戌，初铸新钱，文曰‘乾元重宝’，用一当十，与开元通宝同行用。”乾元二年九月，“戊辰，新铸大钱，文如乾元重宝，而重其轮，用一当五十，以二十二斤成贯。”^③ 乾元重宝钱文为直读，与开元通宝钱文读法一致。以上材料说明，由大唐政府统一铸行的货币，钱文排列以上下、左右直读为正统，视旋读为流俗读法，开元通宝、乾封泉宝、乾元重宝等三类均为大唐政府铸行的钱币，

后两种为年号年，第一、三类钱文直读为唐政府确认的读法，第二类乾封泉宝钱因为旋读，后被朝廷视为“钱文之误”。故笔者提出，咸通玄宝为桂阳监进奉朝廷的试铸钱，理应中规中矩，遵循前例，钱文仍为直读。

此外，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均为年号钱，即使会昌开元，也要在背上加一“昌”字表示会昌年号。“安史之乱”时期，史思明在洛阳铸行得壹元宝、顺天元宝两种钱，后一种钱亦为年号钱（表2）。上述例子说明，以“年号加宝文”的形式来作为钱名，逐渐成为唐代铜钱命名的基本范式。

表2 唐代钱文名称一览

钱文名称	始铸年代	钱币性质	钱文读法
开元通宝	高祖武德四年（621年）	中央统一官铸	直读
乾封泉宝	高宗乾封元年（666年）		旋读
乾元重宝	肃宗乾元元年（758年）		直读
大历元宝	代宗大历年间（766年）	地方官铸	旋读
建中通宝	德宗建中年间（780年）		旋读
咸通玄宝	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年）	桂阳监试铸	直读
得壹元宝	肃宗上元元年（760年）	叛军铸行	旋读
顺天元宝	肃宗上元元年（760年）	叛军铸行	旋读

根据《泉志》所载及唐代钱文名称的发展规律来看，咸通玄宝应是年号钱。“咸通”年号的来历，见于《旧唐书·懿宗本纪》：

懿宗昭圣恭惠孝皇帝讳漼，宣宗长子，母曰元昭皇太后晁氏。……帝姿貌雄杰，有异稠人。……又尝大雪数尺，而帝寝室之上独无，人皆异之。宣宗制《泰边陲乐曲词》有“海岳晏咸通”之句。又大中末，京城小儿叠布渍水，纽之向日，谓之拔晕。帝果以郢王即大位，以咸通为年号。^④

由此可知，“咸通”年号来自于唐宣宗《泰边陲乐曲词》中的“海岳晏咸通”一句。通观唐代钱文，后两字分别为通宝、泉宝、重宝、元宝等，从无“玄宝”之名。故笔者推测，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咸通玄宝”当为“咸通元宝”，为何名为“咸通玄宝”，或

为避讳“元”字，但避讳“元”字的原因，限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笔者尚未找到答案；二是“咸通玄宝”本为“咸通通宝”，但是为了避免钱文中有两个“通”字而改称“玄宝”，如后来的宋代铸钱，为了避免钱文重字而采取特殊的命名方式。“玄宝”的由来，可能与当时钱币的色泽有关，“玄”即黑色，唐代后期铸钱由于合金成分较前期有明显差异，晚唐钱币大多质地不纯，铸工较差，色泽泛黑。“玄宝”之名与《盐铁论》所谓“夏后以玄贝”相映成趣，唐人在命名时有可能师法古人^⑤。

晚唐时期的钱币，制作粗陋，铜色黑浊为其特点之一。例如，对月月痕开元钱，河北易县北寒村发掘唐懿宗咸通五年（864年）孙少矩墓^⑥，河南偃师杏园僖宗中和二年

(882年)李杼墓均有此类钱币出土。字迹模糊,铜色黑浊,极易锈蚀。考古发掘出土的小径开元三型,标本见于陕西西安郊区宣宗大中十二年(858年)路复原墓2枚²⁵,河南禹县白沙晚唐墓4枚²⁶。钱币特点是周郭宽窄不一,铜质发黑,掺杂铁铅,质薄量轻,铸范模糊,钱背穿郭近平²⁷。

据周卫荣先生对早、中、晚三期开元通宝钱的检测,“从这三组图的分布状况来看,早、中、晚开元钱的合金组成的分布非常相象,相对而言,晚期开元的低铜率稍高、低铅率稍低。它们的特征含量分别为:早期,铜72~74%,铅14~16%,锡8~10%;中期,铜72~74%,铅12~14%,锡4~6%;晚期,铜60~62%和70~72%,铅16~18%,锡6~8%。”²⁸可见晚期开元钱含铅量较高,从而导致钱色发黑。

虽然晚期开元与咸通元宝钱名不同,但两者均反映出晚唐钱币的一些共同特征,如色泽发黑、铸工粗劣等,前文介绍的国博馆藏咸通元宝亦有此特点。所以,咸通元宝以“玄”名之,名副其实,但未得到皇帝恩准,有敕停废,不予铸行,故后世罕见。由此看来,第二种推测更具说服力,即为了避免钱文中有两个“通”字而改称“玄”。

四 咸通元宝铸地桂阳监

(一) 桂阳监地望与历史沿革

1. 桂阳监地望

咸通元宝为桂阳监所铸,仅见于《泉志》所载,未见正史记载,但“桂阳监铸钱官”在《新唐书·地理志五》有明确记述:“郴州桂阳郡,上。土贡:赤钱、紵布、丝布。有桂阳监钱官。……义章,(小字注云:中下。萧铣析郴置,武德七年省,八年复置。有银,有铜,有铅)。”²⁹

桂阳监址位于今湖南省郴州市。郴州汉唐时期的历史沿革,在《唐元和郡县图志》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郴州,(桂阳。中。开元户三万二千一

百七十六。乡五十。元和户一万六千四百三十七。)本汉长沙国地,(后)汉分长沙南境立桂阳郡,理郴县,领十一县。隋平陈改为郴州,大业中复为桂阳郡,武德四年为郴州。……管县八:郴,义章,义昌,平阳,资兴,高亭,临武,蓝山。郴县,本汉旧县,项羽徙义帝之所都也。历代属郴阳郡,隋属郴州。桂阳监,在城内。每年铸钱五万贯。³⁰

上文说“桂阳监,在城内”,以此为线索,可以推测出桂阳监的地望所在。“在城内”即唐代郴州城内,该城址上承秦汉,下启宋元明清(图2)³¹,沿革详见于清代《读史方輿纪要》卷八二《湖广八》“郴州废县”:

今州治。秦置郴县,汉为桂阳郡治,后汉以后因之。隋、唐皆为郴州治。五代晋天福初,马氏改曰敦化县,寻复旧。宋仍为郴州治。元至元十三年改为郴阳县,明初废。《城邑考》:州城,汉初所筑,历代因之。明初,因故址修筑,景泰、正德间相继修筑。有门四,城周五里有奇。³²

据了解,今日郴州市区沿用了汉唐明清以来的城址,唐代城址覆压于郴州城区现代建筑之下。经过多年考古发掘,根据唐代墓葬、古井分布和明清郴州城的位置,推测唐代郴州城址范围如下:东以今郴江河为界,原为护城河;南界临郴州市中山东街、中山西街一线,街道南侧的燕泉河原为护城河;西界在北湖路、文化路以西南北一线;北界位于苏园路以南东西一线。今中山北街可能为唐代郴州城中轴线的位置,唐城较汉晋城址面积有所扩大。这一带地势较高,现在主要有郴州市检察院(原为郴州市政府所在地)、军分区、郴州市公安局、郴州六中等单位(图3)³³。唐代桂阳监遗址应在此范围内。

2. 桂阳监历史沿革

关于该钱监的历史沿革,所见最早记录是玄宗开元时期,有可能后来罢铸。至唐元和三年(808年)李巽上书,建议恢复桂阳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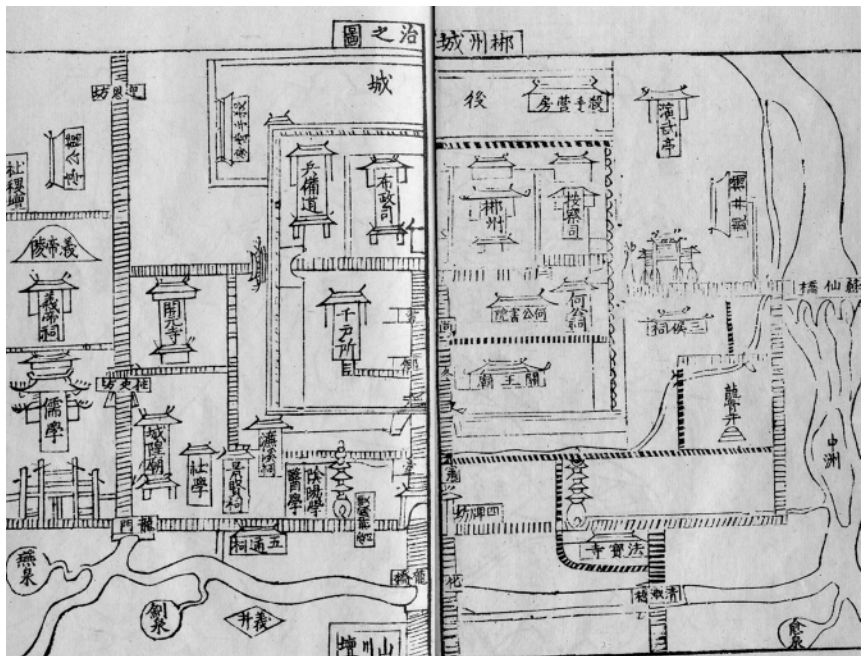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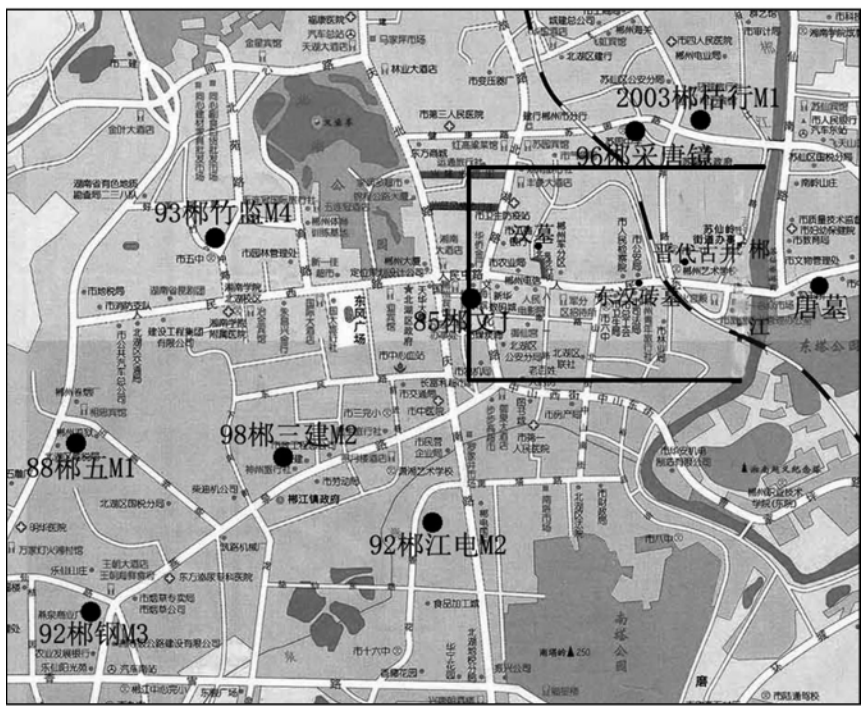


图2 明代万历年间郴州城平面图



图例：——城址范围 ●唐代遗存

图3 唐代郴州城址位置示意图

又重新开始铸钱。咸通十一年（870年），试铸咸通玄宝。

初唐在全国各地设置钱监，其中有桂州监，但没有桂阳监。^③唐代桂阳监的设立，文献记载最早是在开元年间。由《唐六典》可知开元时期郴州铸钱监的大致情况，卷二二《少府监》谈到诸铸钱监的机构设置：

监各一人。（……皇朝少府置十炉，诸州亦皆属焉。及少府罢铸钱，诸州遂别。今绛州三十炉，杨、宣、鄂、蔚各十炉，益、邓、郴各五炉，洋州三炉，定州一炉。）诸铸钱监以所在州府都督、刺史判之；副监一人，上佐判之。丞一人，判司判之；监事一人，参军及县尉知之；录事、府、史，土人为之。^④

其中说到郴州铸钱监设置五炉，机构设置应符合上文中所载，有监、副监、丞、监事、录事、府、史等职。

《通典》卷九《食货九·钱币下》记录了天宝年间各地钱监的基本情况，从中亦可了解到桂阳监炉数、每炉人数、铸作时间、铸钱用料数量等方面信息：

按天宝中，诸州凡置九十九炉铸钱。绛州三十炉，扬、润、宣、鄂、蔚各十炉，益、邓、郴各五炉，洋州三炉，定州一炉。约每炉役丁匠三十人。每年除六月七月停作，余十月作十番。每铸约用铜二万一千二百一十斤，白镴三千七百九斤，黑锡五百四十斤。约每贯钱用铜镴锡价约七百五十文，丁匠在外。每炉计铸钱三千三百贯，约一岁计铸钱三十二万七千余贯文。^⑤

《旧唐书·食货志上》曾谈到唐代元和年间恢复桂阳监铸钱一事，主要就是因为郴州所辖平阳县有着丰富的铜矿资源：

元和三年五月，盐铁使李巽上言“得湖南院申，郴州平阳、高亭两县界，有平阳冶及马迹、曲木等古铜坑，约二百八十余井，差官检覆，实有铜锡。今请于郴州旧桂阳监置炉两所，采铜铸钱，每日约二十贯，计一

年铸成七千贯，有益于人。”从之。^⑥

文中说到元和三年（808年）郴州平阳、高亭两县界有280余井古铜坑，仍有铜锡，故于桂阳监设置两炉，采铜铸钱。《旧唐书·食货志下》亦有关于此事的简略记载：

顺宗即位，有司重奏盐法，以杜佑判盐铁转运使，理于扬州。元和二年三月，以李巽代之。……巽既为盐铁使，大正其事。……置桂阳监，铸平阳铜山为钱。^⑦

根据上述文献，可以对唐代桂阳监的机构设置、炉数及铸钱数量等有一大致了解。桂阳监的兴盛主要有两个阶段，一为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二是宪宗元和年间。开元、天宝之际，桂阳监有五炉，每炉铸钱若以三千三百贯计，则每年铸钱共计一万六千五百贯文；元和年间，设置两炉，每年铸钱七千贯。但是，在《唐元和郡县图志》一书中，却说“桂阳监，在城内。每年铸钱五万贯”^⑧，与《旧唐书·食货志上》所记“一年铸成七千贯”有较大出入。笔者推测，《旧唐书》所载“两炉、七千贯”，应是李巽上言，属于桂阳监恢复阶段规划的铸钱数量，《唐元和郡县图志》云“每年铸钱五万贯”，可能是该钱监在发展达到相当规模之后的铸钱数量。若以每炉一年铸三千三百贯计，每年铸钱五万贯，则反映出桂阳监铸钱炉数已达到15所左右。所以，在此背景下，出现咸通十一年（870年）试铸咸通玄宝的现象，是可以理解的。

“桂阳监”一名，在唐代是指钱监，到了五代后晋时期，则变为一个地理行政区域的名称。《太平寰宇记》卷一一七《江南西道一五》：“桂阳监，在桂阳洞之南。历代已来，或为监出银之务也。晋天福四年，割出郴州平阳、临武两县人户属监。”^⑨明清时期于此设置桂阳州。清代《读史方輿纪要》简述该州沿革：

隋属郴州，大业初复属桂阳郡。唐仍属郴州，后又置桂阳监。（掌铸钱）。五代因

之。宋初亦曰桂阳监，绍兴三年升军。元曰桂阳路。明洪武初改为府，九年降为州，以州治平阳县省入。领县二。今仍为桂阳州，添置嘉禾县，领县三。^①

(二) 唐代桂阳监铸钱的有利条件

唐代之所以在郴州设立桂阳监铸钱，是因为在郴州附近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自汉唐至宋元，各类矿产管理机构及多种矿藏资源屡见诸文献典籍，明清之际有一些矿坑废弃。

《汉书》、《后汉书》的记述极为简略。《汉书·地理志上》：桂阳郡，“有金官”^②。《后汉书·郡国志四》：桂阳郡，“耒阳有铁”^③。《唐元和郡县图志》谈到了唐代郴州所辖平阳县的银、铜矿产情况，其铜矿所出原料，供应桂阳监铸钱：

平阳县，（上。东至州九十九里。）本汉郴县地，东晋陶侃于今理南置，属平阳县。至陈俱废。隋末萧铣分置，武德因而不改。七年省，八年复置。银坑，在县南三十里。所出银，至精好，俗谓之“犒子银”，别处莫及。亦出铜矿，供桂阳监鼓铸。^④

由于郴州矿产资源丰富，曾一度使得铜钱私铸现象严重。《旧唐书·食货志上》：“以至神龙、先天之际，两京用钱尤滥。其郴、衡私铸小钱，才有轮郭，及铁锡五铢之属，亦堪行用。乃有买锡镕销，以钱模夹之，斯须则盈千百，便费用之。”^⑤

宋代郴州的矿产资源分布情况，在《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等书中皆有记载，其中一些矿坑废弃。《太平寰宇记》卷一一七《江南西道一五》：

连州，（连山郡。今理桂阳县。）……土产：钟乳，……细布，白苧，水银，朱砂，白玳。

桂阳县，旧汉县，在桂水之阳，以为名。隋大业中移郡于此。……黄石山，庾穆之《荆州记》：“山出银砾，人常采之。”左思赋“金革银朴”，盖谓此。

……连山县，……铜山，五所。

（桂阳监）土产：古来贡铜、铅，今出银。

管烹银冶处：大宜坑，在监西南城内。

石鸞场，在监北城门外二里。

毛寿坑，在监西北二十里。

大龙、西塘、方仓、龙冈、武全等坑，共一处，在监西南晋岭下八十里。

大湊冈，在县监西。出银、铅矿砂。

白竹冈，在监西南八十里。出银、铅矿砂。

晋岭，在监西南八十里。出银、铅矿砂。

九鼎冈，在监北七十里。出银、铅矿砂。今废。

蓝岭，在监西一百里。出银矿。今废。

潭流岭，在监西北一百三十里。出银矿。今废。^⑥

《元丰九域志》卷六《荆湖路》记述了宋代郴州的矿产资源：“郴州，桂阳郡，军事。……中，桂阳。（州东二百里。八乡。延寿一银坑、一铜坑。）中，宜章。（州南八十五里。五乡。一锡坑。）”^⑦今见传出自江苏南京的十二两半“桂阳军圣节银”银铤实物，就是南宋时期桂阳银矿开采冶炼的真实反映^⑧。

元代郴州仍为产银之地。《元史·食货志二》：“产银之所，在腹里曰大都、真定、保定、云州、般阳、晋宁、怀孟、济南、宁海，……湖广省曰兴国、郴州。”^⑨

明清时期，由于长期开采，郴州一带某些矿产资源已经枯竭，导致矿坑大量废弃。《明史·地理志五》：衡州府桂阳州，“西有大湊山，南有晋岭山，北有潭流岭，旧皆产银、铅矿。”^⑩《永乐大典方志辑佚》引《桂阳志》“山川”条“蓝岭，在平西一百里七十步，周五里，跨临武蓝山之地，荟萃苍翠，远望如蓝，故名。出银、铅，今废。”^⑪

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详细叙述

了衡州府桂阳州所辖山区矿产资源的分布情况:

(九鼎山在)州西北七十里。高三里,周十里。宋时出银、铅,今废。又大湊山,在州西八十里。旧出银坑,淘者纷错,商贾辐辏,因名。近为土贼屯聚处。又毛寿山,在州西二十里。五代时亦出铅,宋废。州西北百三十里,有潭流山,接常宁县界,旧出铅、银砂矿,今废。又晋岭山,在州南八十里。相传晋时亦出银、铅砂矿。志云:桂阳州产银,宋天禧三年置有九坑,曰天(大)湊冈、大板源、龙图、毛寿、九鼎、小白竹、水头、石笋、大富。今皆废。^②

《明史·地理志五》、《读史方輿纪要》记载的“大湊山”,今称宝山,又名芙蓉峰,是郴州市所辖桂阳县(即唐代平阳)县城周围最高的山岭,至今仍在采矿。勘探测定有金、银、铜、铁、钼、铋、铅、锌、铊等多种金属矿物,其中露天采从1966至1995年,采石588万吨^③。

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可知唐代设置桂阳监是由于郴州一带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矿产资源,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之在唐代晚期成为重要钱监之一。由于长时间的过度开采,导致某些矿藏资源在宋代已开始出现枯竭,明清之际一些矿坑废弃。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多年勘探,证实郴州地区仍然是湖南有色金属矿产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④。

五 结 论

本文以国博馆藏唐代咸通元宝作为切入点,对此类钱币类型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探讨,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通过对唐代咸通元宝类型分析,归纳出此类钱币的基本特点,反映出晚唐时期铸钱水平的下降。咸通元宝最早著录见于南宋洪遵《泉志》,清人对此钱有所关注,民国时期偶有著录、收藏。近半个世纪以来,关于咸通元宝的拓本和照片,有多种工具书和钱谱收录。

其二,对咸通元宝钱文做一辨析,将唐代钱文名称进行比较,按照唐代钱名发展规律,提出咸通元宝本应为“咸通通宝”,改“通”为“玄”,是为了避免钱文重字而采取的特殊命名方式。

其三,对铸造成咸通元宝的桂阳监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讨论了桂阳监的地望与历史沿革,分析了该钱监铸钱的有利条件,在于该地区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

附记:承蒙周卫荣先生、罗伯昭先生女儿罗炯老师惠赐参考资料,郴州市文物管理处罗胜强先生提供有关该地区历史、考古及矿产资料,谨致谢忱。

注释:

① a.《中国钱币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中国钱币大辞典·唐五代十国编》,中华书局,2003年,第457页; b. 国博馆藏钱币资料。

② 成都博物院、新都区文物管理所《成都新繁前蜀窖藏钱币清理简报》,《中国钱币》2011年第3期。

③ 何翔、于祖培《甘肃宁县五代十国钱币窖藏发现咸通元宝》,《中国钱币》1996年第1期。

④ a.《古钱大辞典》1、2,表示钱币拓图采自丁福宝编《古钱大辞典》上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2年,第844页; b.《中国钱币大辞典·唐五代十国编》4,表示钱币拓图采自该书第457页,第4枚咸通元宝拓本。

⑤ [宋]洪遵撰、[明]徐象梅校并图篆《泉志》卷三《正用品下》,丛书集成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767册,第20、21页。

⑥ [宋]王应麟辑《玉海》卷一八〇《食货·钱币》“唐铸钱七监、钱官”条,影印本,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第5册,第3308页。

⑦ [清]翁树培《古泉汇考》“咸通元宝”条,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第749页。

⑧ 陈垣撰《史讳举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50、51、60页。

⑨ 关汉亨《“咸通元宝”珍品》,载《中华珍泉追踪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76、77页。

⑩ 陈达农《张叔驯先生的集钱生平》,《中国钱币》2008年第4期。

⑪ 同④a。

⑫ 丁福保原编、马定祥批注《马定祥批注〈历代

古钱图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3页。

⑬ 彭信威 《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17页。

⑭ 同①a。

⑮ 戴葆庭辑，戴志强、沈鸣镛整理 《戴葆庭集拓中外钱币珍品》，中华书局，2008年，第126页，317号拓本。

⑯ 此钱彩图（封底图1）印制不甚清晰，采自马飞海、周祥、罗炯主编 《罗伯昭钱币学文集》“罗伯昭先生捐赠古钱币珍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彩版第18页。

⑰ 同⑤。

⑱ 方若撰 《言钱别录》考十《无考钱考》，收入桑行之等编 《说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881页。

⑲ 《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86年，第2095页；唐石父 《古钱读法》，《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2期；陈铁脚 《“开元”钱文不应该“开通”》，《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5期；黄伟 《规范化：武德钱文直、旋读之争的新诠释》，何力主编：《考古学民族学的探索与实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1—196页。

⑳ 《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第89、90页。

㉑ 《旧唐书》卷一〇《肃宗本纪》，第253、257页。

㉒ 《旧唐书》卷一九上《懿宗本纪》，第649页。

㉓ 这一看法是笔者在2011年5月与导师黄伟先生交流过程中，受到黄老师启发所得。

㉔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河北易县北寒村唐墓》，《文物》1988年第4期。

㉕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西安郊区隋唐墓》，科学出版社，1966年，第19、31页。

㉖ 陈公柔 《白沙唐墓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第1期。

㉗ 徐殿魁 《唐代开元通宝的主要品类和分期》，《中国钱币》1992年第3期。

㉘ 周卫荣 《中国古代钱币合金成分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第307页。

㉙ 《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五》，中华书局，1986年，第1072页。

㉚ [唐] 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 《唐元和郡县图志》下，卷二九《江南道五》“郴州”条，中华书局，2005年，第706、707页。

㉛ 图2采自《万历郴州志》，宁波天一阁藏明万历

刻本影印，上海古籍书店，1962年。

㉜ [清] 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 《读史方輿纪要》卷八二《湖广八》“郴州”条，中华书局，2006年，第八册，3839页。

㉝ 据罗胜强先生提供考古发掘资料。

㉞ 《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上》，第2094页。

㉟ [唐] 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 《唐六典》卷二二《少府监》“诸铸钱监”条，中华书局，2005年，第578、579页。

㊱ [唐] 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 《通典》卷九《食货九·钱币下》，中华书局，1996年，第一册，第204页。

㊲ 同㊱，第2101页。

㊳ 《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下》，第2119页。

㊴ 同㊳。

㊵ [宋] 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 《太平寰宇记》卷一一七《江南西道一五》，中华书局，2007年，第五册，第2369页。

㊶ 同㊵，卷八〇《湖广六》，第八册，第3788、3789页。

㊷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87年，第1594页。

㊸ 《后汉书·郡国志四》，中华书局，1987年，第3483页。

㊹ 同㊸，第708页。

㊺ 同㊹，第2096页。

㊻ 同㊹，第2365—2370页。

㊼ [宋] 王存撰，王文楚、魏高山点校 《元丰九域志》上，卷六《荆湖路》，中华书局，2005年，第262、263页。

㊽ 文汉字 《南宋“桂阳军圣节银”浅析》，《中国钱币》2011年第2期。

㊾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中华书局，1983年，第2378页。

㊿ 《明史》卷四四《地理志五》，中华书局，1987年，第1089页。

① 马蓉等点校 《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中华书局，2004年，第四册，第2384页。

② 同①，第3789页。

③ 据郴州市文物处内部资料。

④ 郴州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郴州地区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821页。

（责任编辑 高聪明）